

清代宁国府毓文书院与乾嘉汉学互动之讨论^{〔*〕}

○ 张晓婧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书院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 其与学术传播和学派传承互相作用。清代宁国府毓文书院变迁与乾嘉汉学发展两者很好地呈现了互动关系。毓文书院通过选聘汉学家担任山长、培养汉学学者、发扬汉学学术和刊刻汉学著作, 促进乾嘉汉学的发展和传播; 乾嘉汉学将毓文书院作为学派基地, 引入汉学新风, 推动书院的革新和演进。清代宁国府毓文书院与乾嘉汉学互动关系的当代启示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山长对书院发展和学派传承至关重要; 书院与学术的良好关系有助于区域文化水平提升; “门户之见”是学术研究的最大障碍。

〔关键词〕毓文书院; 乾嘉汉学; 互动关系; 高等教育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8.04.017

中国传统书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 注重学术研究, 倡导交流互动, 传播研究成果是书院与官学的区别所在。传统书院自产生之日起, 就与学术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南宋以后, 中国学术史上先后涌现出的宋明理学、阳明心学和乾嘉汉学等学术思潮, 均与书院有紧密的关系。然而, 目前学界关于书院与学术的研究多侧重“理学”之于南宋书院、“心学”之于明末书院, 对于清代“汉学”^{〔1〕}与书院之间的关系尚无充分的认识和必要的关注。清代汉学一度成为清代学术的标志, 主要分为皖派、吴派和扬派。张舜徽先生在《清代扬州学记·叙论》中对于汉学三

作者简介: 张晓婧(1981—), 历史学博士, 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本文系 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中国传统书院教育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批准号: COA150139) 的阶段性成果。

派的差异做过精彩的论述,他说:“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2]“皖派”是乾嘉汉学之发端,它的出现是“清代学术发展的高峰”。^[3]汉学之兴,代表了一种新的时代学术精神。清代安徽一地讲求汉学的诸多书院中,徽州府属紫阳书院的影响最大。需要指出的是,该书院讲求汉学并非书院主动适应学术潮流的发展,主要来自于官方的强力干预,可以称之为外部推动型。^[4]宁国府洋川毓文书院则主动回应学术演进的趋势,自身积极探求汉学,可以理解为内部生发型。两者相较,内生型比外推型更能呈现书院与学术的互动关系。故此,本文拟选择毓文书院为典型来管窥乾嘉汉学与清代书院两者的关系,探讨这种关系的意义和影响,并以期对当今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宁国府毓文书院的创建和规制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毓文书院开始创建,至嘉庆元年(1796年)落成,由当地商人谭子文资助兴办。据《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载,“邑人谭子文建,置田百七十亩,生息银四千两。”^[5]仅就资产额度而言,谭氏并非其地之巨商大贾,但是,他以勤俭耐劳白手起家,年过半百仍坚持独力创办书院。建造书院历尽艰辛,受到其他家境殷实之人的冷嘲热讽。《洋川毓文书院碑记》(洪亮吉)对谭子文创办毓文书院的历程有所记载,他写到:“君以勤苦起家,有贸易在庐州府之双河,距家五六百里,君徒步负行囊数日辄往返以为常。五十后家稍起,即割其资之半,创书院于镇之洋山,费白金二万有奇。县固多富人,十倍、数十倍于君者,不下二十家。倍君及与君等者不可数计,始皆笑君所为。”^[6]孙原湘《题毓文书院》则用诗歌的形式加以记述:“赤手开青嶂,风流谭子文。结楼依日月,弃产等烟云。独行千秋想,虚名四郡闻。谤书余一篋,薄俗自纷纷。”^[7]然而,毓文书院建成之后,不仅福泽流布乡里求学子弟,而且将招收生徒的范围扩大到“徽、宁、池、太、广四府一州”^[8]的士子们,成为江南书院之翘楚。

毓文书院的建制规格非常完备,丝毫不逊色于当时一些著名的书院,正如时任安徽督学御使王绶所撰碑记中称:“是役也,不费公帑,不籍众擎,讲堂巍然,廊舍秩如。有亭有楼,有园有池。墙垣庖湫以及需用什物,靡不毕具。”^[9]毓文书院选址于幽静山林,院中教学斋、讲堂、御书楼建造完备,层层递进,应山势之形不断抬高。书院的教学斋房上下楼共三十七间,除此之外,左右两侧前后共三层,三十余间廊舍分布两侧。“文渊所”“适也别境”等观景建筑矗立在正屋右首花园内。上述房舍和斋舍均有编号,分别编成一百零八字号,没有编号的房舍若干,全书院共计房间一百三十六间。书院核心建筑讲坛位于中堂之上,名曰:月午楼。山长孙原湘曾作《月午楼歌》赞美环境之优美和讲学之风尚,诗中“清光愈高读愈苦,月照书丛月色古。仙巢惊起老鹤舞,窗中不知月已午”等诗句记述了书院士子读书之勤奋和刻苦。^[10]毓文书院还建有“适意亭”一所、“文星楼”三层以及凉亭、游廊等休憩之处。各厅堂均备有桌、椅、凳,房舍内还置有床铺及各色家

具。^[11]书院初步落成时,大约共耗费银两一万零五百两。由此可见,书院环境怡人,自然与人文交互辉映,生活所需一应俱全。正可谓是“规画井井,与江南北都会之地所创建者无异”。^[12]

谭子文不仅对书院内部陈设和环境选址严格要求,而且对山长选聘极为重视,选聘山长不唯学派,注重德才兼备。谭子文虽为书院创建者,却不干预书院具体事务,书院的组织管理和教育教学均由山长负责。毓文书院丰厚的待遇和民主的氛围,引得贤士名流竞相前来,潜心教学、培育人才。谭氏还节省自家开支以供书院购买书籍,“君又节省衣食,时市珍异以饒师及生徒之勤学者,简省日用,购经史子籍各书以贻多士之能读者。”洪亮吉对谭子文的义举称赞道:“君之有益于其乡者,又岂仅赈饥恤患,葺桥梁,施医药一时之事可比哉!”^[13] 远近生徒也听闻书院办学严谨和教育有方而纷至沓来。在多方面努力下,书院生徒培养效果突出。例如,仅嘉庆九年(1804年)之前八年间的记载中,七十余人考取功名,不仅有附贡、廩贡,还有举人、进士,均各有著述。杰出生徒颇多、名流贤达聚集的毓文书院被吴景贤先生称为“乾嘉时代安徽方面的一个大书院……颇能代表一时的学风”^[14]。可见,宁国府毓文书院不仅是清代安徽著名的高等学府,也是全国知名的大书院。

二、毓文书院促进乾嘉汉学的传播

宁国府洋川毓文书院积极适应学术自身发展理路,推动清代乾嘉汉学的传播和安徽书院学风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选聘汉学家就任山长,倡导引领汉学学风

书院的核心人物是山长,主导着书院的教育教学和组织管理。历代书院对山长的聘任条件都较为严格,清前期统治者也曾多次下令各督抚严格选聘和考核山长。例如,乾隆时期谕旨各省督抚:“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15] 毓文书院与各省会书院和知名书院相比,并没有因地处僻静和民办性质而降低选聘标准和福利待遇。据院史载,山长的待遇根据科举及第明确分为三个等级,每年延师脩脯,第一等级翰林四百两,第二等级进士三百两,第三等级举人二百两,按季致送。此外,“每年延师支給膳资钱一百六十两,按月致送”,“每年延师程仪二十两”。^[16] 清乾隆年间,江西盱江书院山长 136 两白银,友教书院 200 两白银,湖南城南书院 200 两白银。^[17] 可以看出,与同时期书院相比,毓文书院山长的薪俸是较为优厚的。

有详细资料留存于世的二十二名毓文书院山长中,共八位举人,其余十四位均为进士。进士中不仅有八位翰林,而且有状元、榜眼、探花。担任书院山长的包世臣、孙原湘、夏炘、顾皋、洪亮吉等人均是清代学界有较大影响力的饱学之士。这也是毓文书院媲美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原因所在。笔者爬梳史料,将毓文书院历代汉学家山长情况列简表如下:

表 1 洋川毓文书院汉学家山长一览表

姓名	生卒年份	科举及第	官职	在院时间	著作
洪亮吉	1746~ 1809	乾隆五十五年 (1789)榜眼	贵州学政、翰林 院编修	1802—1805	《授经堂遗集》(又名 《洪北江全集》)
赵良澍	不详	乾隆六十年 (1795)探花	内阁中书	1806—1808	编纂嘉庆《旌德县志》; 《肖岩诗钞》《肖岩文 钞》《读礼记》《读春秋》 《读诗》等
顾皋	1763~ 1832	嘉庆六年 (1801)状元	户部侍郎、内阁 学士、礼部侍郎	1812—1813	《泾皋遗书汇览》《兰竹 说》《秋貂小草》《峰峦 集》《御览诗册》《絨石 庐律赋律诗》《井华词》 《墨竹诗斋古文》
孙原湘	1760— 1829	嘉庆十年 (1805)进士	翰林院编修	1818	《天真阁集》
董桂敷	不详	嘉庆十年 (1805)进士	翰林院编修	1821—1822	《诸史蠹测》《儒先语录 匯参》《解夏小正笺注》 《周官辨非》《十三经管 见》等
帅承瀚	不详	嘉庆十年 (1805)进士	翰林院检讨、太 常寺卿、左副都 御使	1826—1828	
陈守谦	不详	道光十一年 (1831)举人		1840	
包世臣	1775— 1855	嘉庆十三年 (1808)举人	江西新喻县知 县	1844—1850	《小倦游阁集》《说储》 《安吴四种》
马翊宸	不详	嘉庆十四年 (1809)进士	安徽太平知县		《滨河集》
吴文炳	不详	嘉庆六年 (1801)举人	一等候选知县、 蒙城县教谕		
王家相	1762— 1838	嘉庆十四年 (1809)进士	御史、翰林院编 修		《清秘述闻续》《茗香堂 集》
张臣	不详	嘉庆十四年 (1809)进士	宁国府教授		
程表	不详	嘉庆九年 (1804)举人			
胡国梁	不详	道光二年 (1822)解元			
丁金榜	不详	嘉庆十八年 (1813)本省亚 元	大挑教谕		

姓名	生卒年份	科举及第	官职	在院时间	著作
陶兆堂	不详	道光元年 (1821)举人			
阮文藻	不详	道光二年 (1822)进士	泾县知县等		编纂道光《泾县续志》； 《听松涛馆诗选》《宛上 同人集》
夏炘	1789~ 1871	道光五年 (1825)举人	江苏吴江县教谕、 武英殿校录官		《景紫堂全书》
王芳	不详	道光十三年 (1833)进士	国史馆协修官、 翰林院编修		

资料来源：光绪《婺源县志》、嘉靖《江西通志》、道光《商河县志》、道光《泾县续志》、《毓文书院志》、《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清儒学案》、《清史稿》等。

在毓文书院历代山长中，洪亮吉堪称执牛耳者。担任毓文书院山长后，洪亮吉非常重视汉学学风的弘扬，积极采取措施推动汉学发展，新学风蔚然形成。乾嘉汉学领袖朱筠是洪亮吉的老师并耳提面命多年，治学之道悉数传授，其师汉学思想在洪亮吉的教学方法和学术旨趣方面得以承继。尤其在“朱筠使皖”之后，安徽学风也为之一变。^[18]《安徽通史》载：“（朱筠）乾隆十九年进士，三十四年以翰林侍读学士督安徽学政。尝言学政与主试不同。主试惟拔取真才，学政宜随时训谕，俾知勤学立品。又以士必通经，而六书训诂宜先讲习，尝校刊许氏说文颁行各学。安徽文风丕振，皆思读书稽古广益见闻，实由筠倡之。任满回京诸生赍粮受业者甚众。”^[19]《四库全书》纂修的序幕也正是朱筠在安徽学政任内开启，他率先提出设馆辑古书的建议。郭伯恭曾言：“乾隆时代，即类书告终之期，而汉学之研究者，乃进于求读原书之新时代也。此汉学家之新要求，即间接为编纂《四库全书》之一种原动力。”^[20]督皖期间，知名汉学学者黄景仁、王念孙、章学诚等聚集朱筠幕内，协助其校书刊刻，形成讨论经史考据的汉学氛围。洪亮吉《书朱学士遗事》载：“先生去任后二十年中，安徽八府有能通声音训诂，及讲求经史实学者，类皆先生视学时所拔擢。夫学政之能举其职者，不过三年以内士子率教及文风丕变而已。而先生之课士，其效乃见于十年、二十年以后若此。”^[21]《更生斋集》中收录的“春秋十论”^[22]是洪亮吉“壬戌岁在旌德洋山书院课徒因作此”^[23]，更是洪亮吉在毓文书院教授汉学内容的典型案例。除了教学内容和学术讨论方向的改变，书籍之于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也为洪亮吉所关注，其执掌书院后就建议谭子文购买大量书籍。在谭氏的支持下，洪亮吉等人至吴门选购经史子集等书籍共六十种，四千二百一十三卷。其中尤以史部为最多，计二十六种，三千三百五十五卷。洪亮吉在书院志“书籍”一章序中说：“语录盛而经学衰，明中叶后复盛行讲章，而圣人之旨益晦。掇其弊，非研心于六经训诂之书不能挽也。是则经学宜亟讲矣。外此则廿二史可以博览古今，周秦诸子、唐宋总集、类集，可以搜采异同，增广见闻，亦儒家不可少之书也。今据书院所有者录于左，亦以经史子集分部。他日复能购唐宋以前异书以补其缺，则尤所望于后来

者矣。”^[24]因深受其影响，毓文书院生徒大多跳出科举应试的专门训练，而致力于经世济民之实学。

讲究汉学的新风在毓文书院盛行起始于洪亮吉，且因他执掌书院期间教学效果显著和有口皆碑，汉学在安徽的影响不断扩大，形成学风远近闻名、生徒慕名众多的良好局面。继任山长们均以质朴务实为宗旨，延续洪氏办学宗旨和学术精神，使得毓文书院成为“清代有数之重要学府”。^[25]

（二）培养汉学学者和科举人才，全面促进汉学发展

盛朗西先生曾将清代书院分为博习经史词章、考试时文、讲求理学三种类型。^[26]类型不同，书院培养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关于清代汉学书院的培养目标，学者们观点迥异，比如盛朗西、陈东原就认为汉学书院与专课时文的考课型书院不同，是专门培养经史考据人才的地方。

毓文书院以科举应试和讲究汉学为双重目标，并非纯粹讲究汉学而一味排斥科举。书院每年仲春开课，每月两课，举课时间为每月初二和十六两天。考课之后的试卷由山长评定高低，并且送县城印榜公示。公示之后录用考课最佳者作为士子们共赏和共学的对象。^[27]谭子文在书院初具规模后又补捐白银一千五百两，发典生息作为生徒膏火，外课和内课学生分别十五名，由学政和山长共同决定。外课补贴少些，每月银五钱；内课补贴多些，每月银一两。此外，凡是院中肄业生徒科考中第者，均备送花红银五十两。^[28]

乾嘉时期，尊崇汉“专勉实学”的汉学书院不在少数，其中以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最，将科举之学完全排除在教学内容之外。然而，毓文书院对人才全面培养的态度，说明学术研究与科举应试并非水火不容。书院如果完全独立于科举制度之外，成为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也不符合士子们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毓文书院虽是汉学书院，但是却能在坚持自身学术特色的基础上适应科举制度，并且努力纠正“为科举而科举”的偏差，培养较为全面的汉学人才，实属难得。

（三）发明学术、刊刻著作，研究传播汉学

让宋明理学家难以企及的是清代汉学大师在书院教学期间刊印完成诸多代表作品。这说明他们从事书院教育和管理的同时，也潜心学术并著书立说。^[29]山长洪亮吉于嘉庆九年（1804年）仿照南京《紫阳书院志》和《钟山书院志》的体例，撰写并开始刊刻《毓文书院志》，扉页上印有“版藏月午楼”字样。志书内容主要包括毓文书院的创建沿革、经费收支、书院人物、金石艺文、书院藏书等，共八卷。《毓文书院志》包含着洪亮吉作为一代汉学家的治学思想，因而体现出有别于其他书院志的鲜明特征。例如，志书中独辟“金石”一卷。洪亮吉所仿照的两种书院志内容虽然丰富，却没有涉及金石类，所以，他在“金石”一卷的开篇强调：“夫人物所以藻一时，金石所以垂百世，是人物又借金兵以传也。旌德虽僻邑，而刊木勒石之技甲于东南，他日采溪南之石，请县东之人，深刻大书以垂久远，又所望于司其事者矣。”^[30]此卷中选录了官员和学者们所写的书院碑记共五篇，颇为

详细地记载了毓文书院的创设始末、教育教学、经费管理等内容,堪称毓文书院碑记的代表作,为后世了解毓文书院的整体情况及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外,洪亮吉在毓文书院雕刻出版了著名的《更生斋集》,共十六卷,扉页上印字“刊于洋川书院”,参与校订内容的学生都会在卷后列出,说明他注重良好学术风气和严谨学术道德的培育。

其后山长包世臣在毓文书院讲学之余,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写成了《齐民四术》十二卷初稿、《管情三义》八卷,连同之前《中衢一勺》和《艺舟双楫》两种著作,名曰《安吴四种》,共计三十六卷,刊行问世。此外,沈维乔、汪守和、张麟和王绥等时任安徽督学;旌德县知事丁淑监;毓文书院山长孙原湘、顾皋、赵良澍、洪亮吉、朱文翰等所作《毓文书院记》十篇及《重修生云阁记》(包世臣作)、《于文公石岭冲墓表》(帅承瀚作)和《绍军公石岭冲塞》(董桂敷作),均为毓文书院刻本。因评析《古诗十九首》而被后世尊崇的学者饶学斌,曾在毓文书院撰写两卷本《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

除了著书刊刻,传播汉学,山长们对地方志的编纂也很重视。嘉庆十一年(1806年),洪亮吉主修《泾县志》,次年又主修《宁国府志》。嘉庆十三年(1808年),赵良澍主修《旌德县志》。上述地方志是中国历代地方志中的精品之作,编纂风格沿袭了汉学家治学特色。汉学家们的著书刊刻在使自身思想留存于世的同时,也传播了学术、促进了交流,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

从上述三方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毓文书院的汉学学风直接推动了皖地汉学的发展,成为清中叶全国汉学书院的佼佼者。同时,因其在皖地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也直接促进了乾嘉汉学之“皖派”的形成和壮大。书院自南宋以来,就与学术一体繁荣,互为表里、互为依托。书院是学术的基地,学术是书院的精神。二者的关系是“形”与“神”的关系,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三、乾嘉汉学推动毓文书院的发展

毓文书院主动适应清中期的学术演变,推动汉学研究。同时,乾嘉汉学在书院内部的研究和传播也带动了书院自身的变革与发展,给书院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泼气息。汉学推进毓文书院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两方面。

(一) 吹入学术新风,促进书院教学和研究的变革

宋明书院大多以阐发和传播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为主,理学曾对书院的繁荣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延至清代,空谈义理和心性却成为书院教育最大的弊端,甚至阻碍了书院的发展。乾隆帝感慨道:“讲学之人,有诚有伪。诚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31]新的学术汉学的出现让人们耳目一新,汉学具有注重实证、讲求经世致用的特点,这就为书院带来了清新的气息,成为与理学书院相对的新式书院。

理学学术在毓文书院初始阶段还占据着教学和讲学的主流。主要原因是宁国府与徽州府山水相连,朱子理学的大本营徽州府对宁国府的学风影响颇大。

此外,邹守益、王龙溪、钱绪山等理学大师均在宁国府书院和“水西会”等书院联讲会中会讲和讲学,产生很大的影响,引得姚克宽、梅百一、吕定夫等当地士子追随这些大师。毓文书院崇尚理学学风,理学家朱子等牌位供奉于其讲堂正屋即是明证。吴景贤对毓文书院创始之初的学风也做过详细的描述:“旌德与徽州接壤,朱子尝讲学于旌之城南,流风余韵,影响实大。厥后讲学于宁国府属之六邑者,如明之王龙溪、钱绪山、郑谦之辈,又皆接踵而至,是以旌之人士,被治教泽者,实为不少。朱文翰在《赠同学诸子诗》中亦谓‘举头鹿洞风规在,晚进何人敢抗颜?相约潜修崇正学,陈王诸老未应非。’其时院中讲学,以宋明理学为宗,顾不待言。”^[32] 由于地域影响的原因,毓文书院在创始之初如同江南绝大多数书院一样尊崇理学,但是也能顺应潮流,追随学术研究从空谈心性切换到务实考证的转向。安徽督学使沈维鏞对这一转向颇为不满,认为毓文书院:“斤斤焉考据文词是务,党枯籀朽,绘句繙章”。^[33] 毓文书院遭到守旧人士的反对,反面证明其转向的正确与合理。洪亮吉之后,声誉卓著的诸位汉学山长们长时间地维系了毓文书院的汉学风气,是具有深厚社会文化基础的乾嘉汉学的直接反映。

(二) 带动书院成为汉学人才培养基地, 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力

乾嘉汉学大师们以毓文书院为创作基地, 不仅使得自身学术得以延展, 同时也使毓文书院闻名一时, 成为著名的汉学书院。也正因为毓文书院卓有成效的汉学教育, 慕名求学的生徒不断增多。毓文书院可视为乾嘉时期汉学人才的安徽培育基地, 进一步壮大了汉学阵营。

毓文书院历年生徒数额记载目前所及史料尚不完整,《毓文书院志》卷五《人物》中仅收录了洪亮吉初任山长时七十六位生徒的简况。毓文书院志续修到包世臣出任山长时期, 遗憾的是没有续写“人物·弟子”栏。保守估计, 毓文书院四十多年间招收的生徒应有几百人, 汉学人才也占相应比例。六位汉学学者在《更生斋集》和谭敬廷在《毓文书院名贤尺牍》有记载外, 其余都无法考证。生徒七十六人中, 三十七位附生、一位增生、七位廩生, 七人成就较大。^[34] 此七位生徒的情况详见下表:

表 2 毓文书院著名生徒简表

姓名	科举及第	官职	著作
吕伟标	嘉庆十九年(1814) 进士	江宁府教授、知县	《严虹阁诗集》
吕培	嘉庆十八年(1813) 举人	诰授中宪大夫	《五代史补注》、《说文笺》各数十卷, 42卷《四书典制类考》现存
吕伟木	廩生		著作丰富, 多散佚, 仅存金陵纪游诗数十首
陈坡	廩贡生	任合肥、桐城、宁国教谕, 庐州府教授	《谏亭诗草》《天龟解》
陈壤	嘉庆十八年(1813) 举人	怀宁训导	《又次堂诗集》

姓名	科举及第	官职	著作
陈塾	廩贡生		《坝堂诗草》《榆塞吹芦集》
谭正治	附贡生		1卷《历代陵考》、诗集《黄海寻秋》、《洋水研经》、4卷《小尔雅疏证》

资料来源：光绪《青阳县志》卷5《文苑》、道光《旌德县续志》卷7《文苑》、《洋川毓文书院考》。

综上所述，新鲜学术风气的形成，众多汉学优秀人才的涌现，大量汉学研究成果的刊刻等现象的出现，无疑是乾嘉汉学为毓文书院带来的变化，从而扩大了毓文书院的影响，使其突破山野范围，甚至走在全国书院的前列，成为清中叶乾嘉汉学的学术重地。

四、毓文书院与乾嘉汉学互动的启示

（一）书院与学术的互动关系，集中体现在“山长”方面

“山长”是书院的行政之首和学术领袖。宋元明以来书院普遍设立“山长”一职，清代沿袭旧制未变。选聘书院山长在清代前期普遍受到重视，在乾隆时期尤为严格。乾隆三十年（1765年），山长选用和考核在《慎选书院山长谕》有明确要求：“前经降旨，令督抚等慎选山长，如果教术可观，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请酌量议叙。……嗣后均以六年为满，秉公考察，分别核办，庶于劝学程功均有实济。”^[35]

清代书院在聘请山长时都将学术造诣作为主要条件。艾尔曼说：“在清代教育制度的等级序列中，书院的地位最高，这一等级序列强烈有力地表明，在18世纪江南的教育环境中，声望和竞争是谋取教职的关键因素。”^[36]山长都是品德高尚之人，是学术学派引领者，他们借助书院讲坛以发扬学术，传承学派。毓文书院在创立之初，理学还占据着主流。当洪亮吉任山长之后，倡言汉学，风气为之一变。从此，毓文书院推崇汉儒朴实学风，反对盲目崇拜程朱理学“空谈义理”。在此期间，洪亮吉和继任山长们还革新书院教育方法，改变了皖南一带的士习和风气。皖南地区以宁国府毓文书院作为重要的汉学传播中心，通过培养汉学生徒向安徽各地及全国辐射。

（二）书院与学术的互动提升了区域文化水平

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有学者强调：“书院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几乎反映了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后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走向。”^[37]区域文化影响着域内书院的变迁，而域内书院又反过来推动着区域文化的发展。纵观明清两朝，安徽书院的发展与安徽区域文化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动关系。皖南、皖中、皖北三大文化区各异的文化背景，导致书院的发展呈现不同的格局。而区域书院发展程度的不同又直接影响到区域文化兴衰、区域人才的多寡和区域学术风气的浓淡。有关安徽书院与区域文化的关系，笔者曾撰文专门探讨。^[38]

毓文书院的汉学研究活动能够立足理论前沿，积极回应着社会与时代的需求，对区域儒学进行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创造，为区域文化的发展确立了价值内核，在学术理论层面上促进了区域文化的发展。毓文书院的藏书和刻书对于区

域文化的繁荣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书籍不仅记录了书院发展的历程,保存了与书院相关的各种文献,同时也促进了汉学的发展。毓文书院对于汉学人才的培养,更是直接促进了区域人才的兴盛和民智的开启。书院通过学术人才培养,提高了区域士人的文化水平,在地方上造就一批文化精英,从而为区域文化的继续向前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推动力量。

(三)“门户之见”是学术研究最大的阻碍

书院与官学最大的区别,即是倡导“辩难讲学”。无论从书院发展初期还是繁盛时期来看,学术研究都是书院教育教学的根基,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的必要条件。正如胡适所云:“真正的学问研究所,却在书院。求道问学,非书院不可。书院是孕育新的学术思想,产生新学派的孵化器。”^[39]书院在其发展早期,特别是南宋时期,虽然各家学派都有自己教学和讲学的书院,但各学派间并无门户之见,留下了朱陆“鹅湖之会”的佳话和“联属讲会”的大规模学术交流。延至明代中期,书院讲会已是非常兴盛,各类讲会活动声势浩大,引人瞩目。据《明史》记载:“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40]各书院之间积极交流,互相讨论研究成果,甚至将讲会渗透到社会的最下层:“穷乡邃谷,虽田夫野老皆知有会。”^[41]

然而,清代由于书院日益“官学化”,加之乾嘉学术界“汉宋之争”的激烈,各书院中学派斗争较为严重,传统书院日益走向封闭。门户之见和派系斗争只能扼制书院的活力,带来严重不良后果。正因如此,晚清书院改革提倡“汉宋兼采”,并成为学术思潮的主流。

五、结 语

清中叶以后,书院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中,乾嘉汉学的传播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学术潮流。书院组织和汉学学术的密切联系开创了清代中期书院教育改革的新局面,代表了清代书院发展进程中的一大转折。乾嘉汉学依靠书院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南宋以来书院与学术一体化增添了新的内涵。从此,书院在与宋明理学、阳明心学一体化的基础上,又与乾嘉汉学实现紧密互动,使其作为学术机构的内涵进一步丰富。明清时期安徽传统书院中,影响力最大的实为徽州府属紫阳书院,但是六百余年间紫阳书院一直推崇“程朱理学”,既排斥“王湛心学”又摈弃“乾嘉汉学”,学风僵化,思想禁锢,是其学术进步之一大障碍。与之相较,乡村中的毓文书院却能够主动适应学术演进的大势,传播汉学思想,倡导汉学教育,改革教学方式,因此也在与汉学学术的结合中得以发展和光大,实现了双向互动。

注释:

[1]“汉学”的含义在学界有广义与狭义的争论,本文中对于“汉学”的运用采用了较为广义的说法,即“乾嘉学派,清代一个主要学术流派,亦称汉学、朴学或考据学派”。(《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776页。)

[2]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3]戴逸:《汉学探析》,《清史研究集》第2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页。

[4]关于徽州府紫阳书院与学术之间关系的研究,首推民国学者吴景贤,他将紫阳书院八百余年学风的变迁分之为六期。在谈及紫阳书院汉学风确立时,他认为“朱筠使皖”,朱筠作为政府官员将江永、汪绂等汉学家木主入祀紫阳书院,绝对是个标志性事件。(吴景贤:《紫阳书院沿革考》,《学风》第4卷第7期,1934年,第24页)此外,李琳琦:《徽州书院略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2年第2期)、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也持此观点。因此,笔者认为徽州府紫阳书院学风的改变主要是官府行为,并非书院与学术积极互动之代表。

[5]何绍基:《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92《书院》,清光绪四年刻本。

[6][9][12][13][30]洪亮吉:《毓文书院志》,《卷六·金石》,清嘉庆九年刊本。

[7]孙原湘:《天真阁集》,《卷二十三·诗二十三》,清嘉庆五年刻增修本。

[8]洪亮吉:《毓文书院志·序》,清嘉庆九年刊本。

[10]孙原湘:《天真阁集》,《卷二十二·诗二十二》,清嘉庆五年刻增修本。

[11]洪亮吉:《毓文书院志》,《卷四·廡舍》,清嘉庆九年刊本。

[14][25][27][32][33]吴景贤:《洋川毓文书院考》,《学风》第七卷第四期,合肥:安徽省立图书馆编印,1936年。

[15][35]《清高宗实录》卷746,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16][28]洪亮吉:《毓文书院志》,《卷二·经费》,清嘉庆九年刊本。

[17]胡青:《为中国古代“尊师重教”释义——从清代书院山长说开去》,《江西教育科研》1995年第6期。

[18]关于朱筠对安徽学风转变和清中叶学术变迁的贡献,参见林存阳:《朱筠与清中叶学术变迁》,《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9]《重修安徽通志》卷138《名宦》,清光绪七年刻本。

[20]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版,第2页。

[21]洪亮吉:《洪亮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035页。

[22]具体内容涉及:春秋时以大邑为县始于楚论、春秋时不讳娶同姓论、春秋时晋大夫皆以采邑为氏论、春秋惟秦不用同姓而喜用别国人论、春秋晋比楚少?论、春秋时君臣上下同名不甚避讳论、春秋时楚国人人文最盛论、春秋时以隐疾为名论、春秋时仲尼弟子皆忠于鲁国并善守师法论。

[23]洪亮吉:《更生斋集之文甲集》,卷2《春秋十论》,清光绪三年洪氏授经堂刻增修本。

[24]洪亮吉:《毓文书院志》,《卷八·艺文》,清嘉庆九年刊本。

[26]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民国丛书》第三编第45册,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154页。

[29]陈谷嘉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99页。

[31]《清高宗实录》卷128,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

[34]《旌德县续志》卷7《文苑》,《安徽历代方志丛书》,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

[36][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5页。

[37]丁刚等:《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前言。

[38]参阅张晓婧:《论明代安徽书院的发展和区域文化的互动》,《安徽史学》2008年第2期,第26—29页。

[39]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1924年第21期。

[40]张廷玉:《明史》卷231《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053页。

[41]钱德洪:《惜阴会语》,《钱德洪语录诗文集辑佚》,南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77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